

戰爭、媒體與科學人： 談凱利博士事件

陳世榮

「我 怎會淪落到這樣的地步？是我真的說錯話了嗎？我洩漏了國家機密了嗎？為什麼唐寧街與國防部出賣我，讓我在全世界媒體前出盡洋相？難道我不應該告訴記者，伊拉克只有30%的可能擁有生化武器嗎？可是我並沒說政府在《九月文件》中造假呀？我也沒有反駁『伊拉克可以在45分鐘內啟用某些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說法呀？有嗎？我只是私下覺得這個說法有點誇張罷了！還是記者們穿鑿附會，對我的話做太多聯想？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該負什麼責任？我不該說實話嗎？」

這些是筆者想像英國國防部生化武器專家大衛·凱利 (David Kelly) 生前心中可能思索的問題。2003年7月17日凱利博士被發現於自宅附近自殺身亡。當然，究竟是不是自殺，仍然有不少的揣測與質疑。他死亡前4個月，英美聯軍入侵伊拉克，所持理由正是推翻哈珊政權，斷絕其對恐怖組織的資助，銷毀伊拉克境內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加入武檢行列

凱利的外表就像我們在大學裡擦肩而過的教授，平易近人但執著專精。他是牛津大學出身的微生物專家，早年投身於農學與生物殺蟲製劑，1984年被任命為英國國防科技實驗室「波登當」(Porton Down) 的微生物學首席。1980年代，凱利深入蘇聯境內擔任英美方的生化武檢領導人之一，有突破性的調查發現。1990年代再蒙聯合國武檢團邀請，加入對巴格達的武



凱利在接受英國下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質詢時面容憔悴

檢行列，進出伊拉克達36次之多。

因此，他雖身為科學家，卻經常處於戰爭與和平的險惡灰色地帶，進行著與一般學院科學家極為不同的知識生產與知識分享工作。遺憾的是，伊拉克的武檢工作引領他走入死亡的淵谷。凱利死前兩天，接受下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公開聽證會調查。他憔悴的面容與黯啞的聲語中，顯露了他對所遭遇處境的無奈。他似乎

是在極意外的狀況下發現自己身處於政治、媒體與科學混雜的現代叢林。

身陷政治風暴

凱利有長期的武檢經驗，除了政府單位，他必須經常與非政府組織、學術單位以及媒體接觸。他自認能把握分寸，為什麼會在這次事件中出了差錯呢？

英國政府為了取得出兵伊拉克的正當性，要求情報單位評估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可能性。2002年4-6月間，凱利參與了這份綜合性情報文件的撰寫，並有機會看到該文件的其他部分。2002年9月，內閣公布該份文件，後來稱為《九月文件》。首相布萊爾依據該文件的摘要向議會宣稱：「伊拉克可以在45分鐘內啟用某些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後來這份文件也成為美國國務卿在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發言的依據。

雖然凱利認為，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推翻哈珊政權才能免除後患，但也表示《九月文件》的內容過於武

斷。從後續片段事證中顯示，凱利依據專業判斷對於「45分鐘」的說法是感到不安的，因此才會與媒體有較不尋常的接觸。

事實上，內閣在後來改寫公布的《二月文件》中，就摘除了對伊拉克「45分鐘」的指控。不料，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吉利根與瓦姿在與凱利接觸後，分別在《今日》與《新聞夜》節目中以「引述國防部不具名官員」的方式，爆料指出唐寧街知情報不可靠卻硬塞進「45分鐘」說詞，也就是認定政府高層刻意栽贓伊拉克有立即啟動核生化戰爭的危險。結果，全球輿論譁然，媒體競相報導，布萊爾內閣的誠信陷入空前的危機。

這時，凱利也意識到記者所指稱的消息來源可能正是他本人，而且事態嚴重，於是主動向國防部回報。英國政府處理本案最可議之處，便在於主動公布凱利身分。布萊爾甚至親自向BBC施壓，迫其揭露消息來源，內閣更讓凱利單獨接受下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公開質詢。凱利當時承受的身心壓力可想而知。

凱利過世後，英國政府委請赫頓法官就凱利死因進行獨立調查。一年後，《赫頓報告》出爐，竟然一面倒地為當朝政府開罪，指出凱利的死亡不能怪罪內閣，卻將矛頭指向BBC，認為BBC未審慎處理新聞內容。

《赫頓報告》最後迫使BBC高級主管去職，卻沒有告訴世人凱利尋短的理由，以及英國政府情報誤判的詳情。凱利顯然企圖盡力維持身為政府科學家的分際，但又希望釐清在政府壓力下所可能造成的情報扭曲。這種原本就很難做到的價值平衡與專業堅持，終究禁不起政治風暴的拉扯與撕裂。

媒體的義與不義

英國政府對凱利不夠厚道，媒體對凱利也不見得友善。BBC的爆料一度形成內閣與BBC的緊張對立，儘管在各方壓力下，BBC仍堅持保護資料來源，一直到凱利死後第三天，才在凱利家人同意下揭露凱利是主要消息來源。

但事後的調查卻令人意外地發現，記者吉利根竟然曾「指導」一位外交委員會的調查議員「如何質詢凱利」，為媒體專業精神與倫理維繫做了最壞的榜

樣。加上吉利根多次收回指控政府的用詞，使他穿鑿附會凱利博士言詞的可能性大增。凱利因工作關係，特別受到外交部授權，可以就武檢情形與媒體接觸，沒想到前來請益的媒體竟然對他落井下石。

其實，整個英國媒體界對這次事件也沒有善盡職責，例如前聯合國武檢團首席檢查員史考特·萊特（Scott Ritter）曾經指出，伊拉克境內90-95%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在1998年12月前就已廢除，這樣的說明其實足以反駁英美領導人的說法。

但就連以自由派自居的《衛報》與《觀察家》，在整個2003年有關伊拉克的12,447件報導中，僅僅17次附帶地提到萊特的說明；在《獨立報》的5,648件報導中僅被提及7次。可見在事件過程中，媒體陷入狂熱的新聞追逐，只想利用凱利這一極具神祕與聳動的「幕後消息來源」，來凸顯內閣在說謊，以炒作新聞，卻未能廣泛蒐集資料，做更深入持平的分析。

凱利事件後的省思

如今在遍尋不著具體事證後，就連以美國代表為主的「伊拉克調查團」，都不得不宣布終止對伊拉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檢查，顯然戰前的「45分鐘」指控是難以成立的。

凱利從生化武器的原料獲得、運輸、研製、儲存、部署、指揮、射控、天候、效果等系列條件，推論伊拉克擁有與使用生化武器的可能性低。但這種以專業認知所做的判斷，不會單純地只用來揭露真相，它牽連著許多價值、利益與權力因素，例如身家性命、職業道德、上級期許、國家利益、政治正確、戰爭名義、國際衝突、以及在戰火中犧牲的無辜性命。

若我們回想911後，整個反恐政治氣氛對國際視聽與英美行政部門所產生彌天蓋地的影響，便可以理解：科學與專業可以被左右，真相有時難以彰顯。凱利博士事件絕不會是孤例，反映的是現代「科學與政治」中深沈的矛盾與衝突——是我們必須給予更多關注與反省的課題。

陳世榮

國防大學中正理工學院通識教育中心